

《四书按稿》非江永所作考论*

徐道彬

《续修四库全书》第166册收《四书按稿》一部,原书系清抄稿本,编者将作者定为“[清]江永撰”。原书稿藏于复旦大学图书馆,馆方确认其为清乾隆十五年抄本。该书版框高212毫米,宽310毫米,无栅栏框格,每页以上下两栏抄录,共205页。藏弃者做出上述判断的依据主要有两点:一是该书第一部分《大学》下署有“婺源江永慎修稿”一行七字;二是《论语·乡党》结尾处留有“戊辰巧日录订于飞仙阁”十字,全书结尾处记有“乾隆庚午十月小雪日录毕”十字。“乾隆庚午”即乾隆十五年。然而,通览全书一过,可疑之处甚多,谨举大要,辨析如后。

一、由文体形式以观其伪

江永(1681-1762),字慎修,清代徽州婺源人,经学家。一生蛰居乡里,“槌户授徒”^①,“身侧科举之林,心游科举之外”^②,潜心于著述与教学,举凡古今制度、天文舆地、历算吕律,无不博综淹贯,“经术湛深,士林望重”^③,“自汉经师康成后,罕其俦匹”^④。其及门弟子众多,名著一时者有戴震、程瑶田、金榜、郑牧、汪肇龙、方希原、汪梧凤等。主要著作有《礼书纲目》、《古韵标准》、《四书典林》、《推步法解》、《近思录集注》等,被《四库全书》收录13种(外有3种存目)。

1. 由公私著录以考其伪

据《江慎修先生年谱》记,乾隆十三至十五年,谱主执教于婺城的汪升家馆,再过两年即癸酉年,又迁“馆歙邑西溪,歙门人方矩、金榜、汪梧凤、吴绍泽

* 本文获得安徽省教育厅社科重点项目(2011sk071zd)资助,又承陈祖武师批改教正,一并致谢。

① 钱大昕:《江先生传》,《碑传集》卷一三三,中华书局,1993年。

② 余龙光:《双池先生年谱》,《清代徽人年谱合刊》上,黄山书社,2006年,第198页。

③ 江锦波:《江慎修先生年谱》,《清代徽人年谱合刊》上,第66页。

④ 戴震:《江先生永事略状》,《碑传集》卷一三三。

从学。休宁郑牧、戴震、歙汪肇龙、程瑶田前已拜门下问业。是年，殷勤问难，必候口讲指画，数日而后去”^①。江氏以授徒老儒终其一生，所学虽尚考证，而教授经义与时文则是当时的首要任务。如果他著有《四书按稿》，也应当为应考的生徒们所熟知。但是遍览江氏著述和后人记载江氏的年谱、行状、墓志铭等传记文，从未有人提到《四书按稿》一书。此外，无论是《清史稿艺文志》及其补编，还是《中国丛书综录》，都不曾见有著录^②。时至今日，我们在编撰《徽州文献综录》的过程中，集录爬梳包括《皖人书录》在内的各地多种文献，徽州人著述中的四书文册，比比皆是，但无一署名江永或题作《四书按稿》者。因此，《续修四库全书》中著录此书，难免启人疑窦。

2. 从结构章法上疑其伪

《四书按稿》既无序言，也无目录、凡例、跋文。内容按《大学》（7页半）、《中庸》（18页半）、《论语》（78页半）、《孟子》（87页）四部分顺序排列。四个部分中，《大学》和《中庸》有标题，《论语》和《孟子》无标题，仅以两书的首篇《学而》和《梁惠王》以示区分。全书不录《四书》原文，只标注章节目录于上，取两字以标目，或抄撮成文，或自加按语，人物和书名标注并不规范，且不分卷。文字较为简略，引述文与按语之间留有空格，有些篇章文字右侧标有简略的句读。此外，本书在《中庸》之后的89至102页之间，插入了一部《中庸全解》（13页半），按章论述，文字量较多，无标识和按语，也无引述他人之说，内容体式与之前《中庸》不同，也与全书体例不符，显得章法凌乱，文气不接，有夹杂拼凑之感。除了唯一一处标有江永之名外，其他地方不见有任何署名记录。核之江永的著述风格和严谨态度，几乎可以判定不是江氏之作。

3. 由避帝讳、家讳以察其伪

《四书按稿》的抄录时间为乾隆十三（戊辰）至十五年（庚午），此一时期文字狱的严酷性，足以震慑朝野。文字违碍、帝王避讳等都已成常识，戴名世《南山集》案和吕留良案更令知识界心有馀悸。曾奉康熙之命编撰《广群芳谱》而享盛誉的徽州人汪灏，就因替《南山集》作序而处斩刑；桐城方苞文章涉及戴氏者，就换用戴之异名宋潜虚；姚鼐著述中也从未提及“戴名世”三字。这些对于近时近地的江永来说，应当深知其中利害。据清代磨勘条例：不谙禁例，直书庙讳御名及先师孔子讳者，均罚停四科。奇怪的是，本书多次出现“高中玄”之名。如《四书按稿·论语》“‘公绰’章”下引“高中玄”之语（第158页），且加了圈点以示着重；又《论语》“‘或曰’三节”下（第161页）和《孟子》“‘形色’章”下（第257页）皆引用了“高中玄”的言辞以为证据。如此公然不避清圣祖名讳之忌，岂非以卵击石！“高中玄”即明代学者高拱，撰著者完

①《江慎修先生年谱》，第63页。

②《中国古籍善本书目·经部》收录有“《四书按稿》三十卷，清江永撰，清乾隆十五年抄本”，也是由复旦大学图书馆提供的，与《续修四库全书》同一出处。

全可用其名代替之,无须冒险触怒龙颜。

该书稿第83页、第142页等处还多次出现“徐玄扈”三字,徐玄扈即明代徐光启(号玄扈,谥号文定公),作者引用徐氏言论,为何不用字号称谓而明知故犯,也令人匪夷所思。又如第156页、第184页等处引用“徐徽弦”语,“弦”字也不缺笔。更有甚者,此书还大量地引用“吕晚村”的论述(吕留良有《四书讲义》43卷),如《四书按稿·论语》“‘有子’章”下(第102页);“‘贤贤’章”下(第103页);《孟子》“‘行有’二节”和“‘恒言’章”下(第213页);“‘天下’章”下(第214页)。诸如此类,俯拾即是。吕留良案发雍正六年(1728),江永时年48岁,对朝廷处理吕氏案及其影响定当熟知。对于吕氏文章,时人皆讳莫如深,一向淡薄谨慎的江氏岂敢冒天下之大不韪?如果翻阅江永的其他著述,如《河洛精蕴》一书,即可见到书中将“玄”皆改为“元”字,如“太元”、“元木”、“元武”等,由此推论,《四书按稿》不似江氏所为。

其次,《四书按稿》若是江永所作,更当避其家讳。江永之父名期,而书中多次出现“期”字,如《中庸》“‘齐明’节”有“往来不愆其期而致厚”语(第79页),此“期”字本可改为“时、日”等字,简单易行。又“‘博学’节”有“总期明善诚身以见人道”语(第80页),此“期”可改为“望、冀”等字;《论语》“‘定公’三节”云:“按兴字兼创业守成言。几,训期,云一言力微,未可期必也”;又同页“‘子夏’章”有“故以王道之悠远博大者期之”语(第154页);又《论语》“‘食天’二节”引《存疑》云:“食稻衣锦是指期年外说,盖宰我即说期可,则期年之内已知不可食稻衣锦矣”(第174页);《孟子》“‘是集’节”有“气乃不期而自生”语(第193页)等等。上引“期”字本可替换他字,却一仍其旧,不可思议。如果说此书作者狂妄,不知避忌,那么该书在《孟子》“‘吾欲’二节”对“华夷之辨”有论云:“因之本论税法,便说到华夷界限,此处关系乾坤混沌,民物腥羶,裂冠左衽,直令闻者心怖胆慑,不敢置喙”(第246页)。可见作者深知避讳之有关性命和伦理,如谓这样的行文亦出江永之手,则有悖情理。搜检江永《礼书纲目》、《近思录集注》、《群经补义》等著作,文中从未出现过“玄”“弘”“期”三字。笔者曾翻阅南京图书馆所藏乾隆七年(1742)的《近思录集注》刻本,即江氏成书的当年刻本,其中有17处“弘”字缺笔,遇有“圣”字则提行,并凸出原版框一个字格。江氏对避讳问题也随时留意,例如其《群经补义》卷四论“秀”字云:“《说文》于秀字无释,避光武讳,故缺其义。”^①由此看来,此书不避帝讳、家讳,对朝廷叛逆之徒的言论也大加引用,当然不可能是江氏所为。

4. 从文体风格上考辨其伪

江永作为坐馆老儒,当为参加科举考试的士子前途负责,故而对四书文也有深入研究,《四书典林》和《四书古人典林》就是他的镇馆之宝,坊间多有刊

^①《清经解》二,江苏古籍出版社,2005年,第1998页。

刻,流行也广。尽管偏重考证的《典林》与当时流行的八股制艺迥然有别,但已遭到其同乡学者汪绂的异议。既然如此,那么庸俗浅陋的兔园册子就更是江永不愿、也不屑为的。江氏云:“至若拙刻有《四书典林》三十卷、《四书古人典林》十二卷,此别有其故,盖食贫不免授徒,授徒须讲时艺。学徒资分不齐,不能尽读经书,临文多有寒俭之病,所读时艺亦多不得其典据。是以设为方便法门,取《四书》中有典实处,分为门目,援众籍以实之。此犹《初学记》、《北堂书钞》、《韵府群玉》之类,令讨文家便于取材耳。徒辈惮其抄录之烦,遂梓之。非欲以是引人为短订之习,足下(按指汪绂)亦可以不必苛求也。”^①他还告诉汪绂道:“《典林》之刻,原非本怀。事既已成,无可复说。足下缕缕规海,敢不祇领。科举陋习,少即厌之,不得已而随行逐队,身侧科举之林,心游科举之外。”^②江永虽为方便“讨文家”取材,不得已而作《典林》,但其书绝无短订之习、抄撮之病。汪绂也知“《典林》之刻,出于徒辈,知非足下(按指江永)所得已。然与其开方便之法门,孰若激励之使从事于经学?如果资分庸下,则足下又安能以《典林》一书强之记忆?彼其于抄录且不无惮烦,而欲使之成诵,以几左右逢源,不愈难哉?……虽未能弃时艺不讲,而要当由心得以为文章,实践力行,何妨举业?今人因时艺而讲经学,亦已颠矣,况乃弃经学不讲,而从事于汗漫之书抄,不亦伤乎?”^③《典林》内容涉及经史子集,于天文地理、王侯国邑、政事礼制等多有考证,与《四书按稿》的形式和内容皆风马牛不相及。

江永坐馆多年,曾欲对四书经义做过系统阐释,但“未敢轻率下笔”,曾与汪绂言曰:“《四书解》,学徒屡有请,而规模难定,盖详则太纷,略则太约,未敢轻率下笔。惟取数章晦蚀于庸俗之说、不得圣贤真旨者,为之详说。若‘君子无所争’、‘有教无类’、‘日知其所无’诸章,及《中庸》‘仁者,人也’两节;《孟子》‘天下之言性也’一章,余则见之笔记。”^④《四书解》是何种笔记已不可考,但依其所言几章与《四书按稿》的相应内容对照,可以看到《四书按稿》中《论语·八佾》“君子无所争”下,附以他人之言,按语简略,言:“首句每易说得太高,便似《老庄·齐物》之意,非圣贤语气。只说是抑然自下不多欲上人,方与雍容抑逊意思一线贯串……。”语意寡淡,不涉考证(第110页);《论语·卫灵公》“有教无类”下,全引《困勉录》语而不见自己的文字(第167页);《论

①《双池先生年谱》,第182页。

②《双池先生年谱》,第199页。

③《双池先生年谱》,第189-190页。

④《双池先生年谱》,第198页。依《皖人书录》(黄山书社,1989年,第482页)所按:《读书随笔》12卷就是《周礼疑义举要》7卷和《群经补义》5卷的合集。因史馆徵取江氏遗书时,随笔之名难以缮进。于是由戴震整理时,分为两书,并题今名,皆为深奥的文字考证。《四库全书总目》称二书“融会郑注,参以新说,于经义多所阐发”。此外,《善餘堂文集》(吴县潘氏宝山楼抄本,上海图书馆藏)中有《随笔札记》数条,皆为礼仪制度、文字音韵的考辨,其中并无四书文的有关文字记述。

语·子张》“日知其所无”下有按语 71 字,完全是淡而无味的时文套语(第 177 页)。《中庸》“仁者,人也”的按语,语气和用词几近现代,其言:“礼是天理之节文,有此天理便有此节文,这个礼难道不是天理所生成,与仁义同原,不假安排措置者乎?”(第 78 页),而此书所附《中庸全解》中竟无一句及此;《孟子·离娄下》“天下之言性也”下,又全引吕晚村语(第 222 页),无半句己说。江永有《读书随笔》十二卷,《四库全书总目》称其“考证赅洽,于经文注义均有发明,固非空谈者所及,亦非捃拾为博者所及也”。^①其中的《群经补义》五卷中有几条对四书经义的考证,但训诂比勘,深奥难解,与《四书按稿》的语浅义简绝不相类。

5. 从治学风格上论其作伪

作为“皖派”朴学的代表人物,江永“读书好深思,长于比勘”^②,其作文风格是“综形名,任裁断”,不讲求文字表达技巧而惟实事求是,章太炎称之为“分析条理,皆缜密严紧,上溯古义,而断以己之律令”^③。其学尚考核,而鄙弃玄言义解,对明人之学讳而不言。江氏常云:“古人训释义理每借字声以明义,声近则义亦相通。如云:仁者人也,义者宜也;诚者自成也,而道者自道也,礼者犹体也;又云礼者履此者也,乐者乐也,德者得也,政者正也,刑者例也,此类甚多。识得此例,方知《中庸》以人训仁,古人自有意思,当得诸言意之表。”^④可知江氏与理学家、时文家的治学路数迥然不同。即使言性言理之作如《近思录集注》,也是“间亦附以己意,引据颇为详洽。盖永邃于经学,究心古义,穿穴于典籍者深,虽以余力为此书,亦具有体例,与空谈尊朱子者异也”。^⑤再看《四书按稿》的论说、引述与行文风格,都似近代话语,且内容浅近,从未涉及汉唐以前的注疏,如赵岐《孟子章句》、何晏《论语集解》等,也不见清初阎若璩《四书释地》、胡渭《大学翼真》、黄宗羲《孟子师说》、孙奇逢《四书近指》之类考据性的四书文。凡此绝不合乎江永的著述特点和思想风格。

二、由思想内容以证其伪

1. 从文中引用人物的学术倾向上以考其伪

《四书按稿》名为“按稿”而实为“集注”,因为其中引用他人的言论占去绝大部分,自己的按语只占一小部分。也可以说,此书主要是摘录引用了陆陇其《困勉录》及宋元明清时期的诸多时文名家之言,引述文字也多是融贯删节,不尽依原文。

^①参见《四库全书总目》“经部五经总义类”之《群经补义》。

^②戴震:《江先生永事略状》。

^③《章太炎学术史论集》,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,1997年,第328页。

^④江永:《善馀堂文集·随笔札记》,吴县潘氏宝山楼抄本,上海图书馆藏。

^⑤《四库全书总目》“子部儒家类二”,中华书局,1965年。

陆氏《困勉录》“因彦陵张氏讲义原本，删剟精要，益以明季诸家之说，而参配以己义”^①。而《四书按稿》中引用最多的书和人就是《困勉录》和张彦陵（明代仁和人，名振渊）^②，其次是泉州的时文四大家及其四书文：蔡清《四书蒙引》、林希元《四书存疑》、陈琛《四书浅说》、苏浚《四书镜》，以及吴因之（默）、吕晚村（留良）、汪大全、仇沧柱、李毅侯等人的四书注释文。除此以外，按引用书目次数的多少便是《四书翼注》、《四书体注》、《四书大全》、《四书脉》、《四书家训》、《赛合注》、《续困勉录》、《摘训》、《合参》、《合注》、《说约》、《朱子语类》、《析疑》、《朱子小注》、《或问》、《张子正蒙》、《四书读》、《湖南讲》、《说丛》、《明辩录》、《辨志》、《直解》、《存疑》等。本书引用书名不合规范，有些书名在通览全书后才知其全称，如《翼注》、《体注》、《大全》等，有些只有简称，不能确定书名，也不知作者是谁，如《赛合注》等，可见该书并不严谨，不似朴学家的风格。从引述的人物来看也是如此，都是时文名家和散文家，按时间罗列，有宋元时的朱熹、黄勉斋（榦）、陈潜室（埴）、叶少蕴（梦得）、程伯淳（颢）、张南轩（栻）、陆象山（九渊）、饶双峰（鲁）、邵康节（雍）、胡凝初、司马温公（光）。明代人物出现最多，其中包括了时文四大家：王凤洲（世贞）、唐顺之（荆川）、胡思泉（友信）、王文恪（鏊）；江西时文四家：陈大士（际泰）、艾千子（南英）^③、章大力（世纯）、罗万藻^④。本书引用明末清初人物不多，而出现频率最高，如吕晚村、仇沧柱（兆鳌）、陆稼书（陇其）三人的言论几乎占有全书的四分之一，此外还有李安溪（光地）、刁蒙吉（包）、熊伯甘、张京江（玉书）、方灵皋（苞）、刘克猷（子壮）、吴省庵、马世俊、张紫登等。再者就是大量地引用“时文李作”、“名文冯作”、“明名文徐作”、“时艺文郑作”等等，也有直接引用“副墨”、“比文”的。从书中引用的人物来看，本书作者最喜明代时文，尤其以明末清初浙江、江西的理学家和文人居多，这些人物在江永的两部四书文著作里都不曾见到，在行文风格上更是“道不同不相为谋”。

从《四书按稿》所引人物的学术思想上看，不分朱、陆，不辨理学和心学，也有悖于江永的思想倾向。江氏“守朱子圭臬”，“不为浮诞，讲论经义，精核贯通，犹有能守大儒之遗教，而出乎流俗者焉”^⑤。江氏屡言“《近思录》，吾人最

①《四库全书总目》经部四书类二。

②陆陇其《四书讲义困勉录》中引张彦陵 648 次，吴因之 124 次，而江永《近思录集注》中从未见有陆陇其、《困勉录》、张彦陵、吴因之的书名或人名。

③艾南英的《艾千子先生全稿》是吕留良所辑评，康熙时有天童楼刻本，后为禁书。而《四书按稿》中多引有艾氏语，与江氏所为不合。

④该书中作罗文藻，疑有误。据北京大学图书馆藏善本《明朝百家小传》载有“罗万藻字文止，江西临川人”。而罗文藻（1616-1691）福建福安人，是中国籍的第一个天主教主教。罗万藻为明末古文家，与前三人并称“临川四才子”。《四书按稿》多次错写人名，可见其学风并不严谨。

⑤姚鼐：《吴石湖家传》，《惜抱轩诗文集·后集》卷五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92 年。

切要之书,案头不可离者”^①;“晚学幸生朱子之乡,取其遗编,辑而释之,或亦儒先之志”^②;“一尊旧统,以述朱为正”^③。在江氏的学术著述中,基本上只采录周敦颐、二程和朱子之说,很少涉及元明学者。而《四书按稿》晚于《近思录集注》近十年,书中所引明代人却最多,且从未一见《近思录》,也未提及《近思录集注》;所引朱熹言论颇多,只径称“朱子”,无《近思录集注》中常言的“乡邦大儒”、“我郡子朱子”之类的称呼。然而,《四书按稿》中引述的人物有径称“先生”者,惟有“稼书先生”、“震川先生”、“荆川先生”三人,引述最多者是陆陇其(稼书)《困勉录》、张彦陵、吴因之,而在江永《近思录集注》中却从未见有此等人物。如此等等,皆有悖于逻辑和情理,伪迹昭然。

其次,从地域学术而言,元明清时期,徽州继朱子理学后,本土涌现出大量有关四书经义的著述。如倪士毅《四书辑释》、陈栌《四书发明》、程复心《四书章句纂释》、刘刻《四书通义》等比比皆是,朱以礼、郑玉、赵汾、汪克宽、程敏政、汪道昆之辈则无论焉。仅婺源一县就有胡升《四书增释》、江凯《四书讲义》、吴程《四书经传释文》、汪炎昶《四书辑疏》、胡次炎《四书注》、程霆《四书说》、洪应绍《四书解》、戴文仲《四书考》、余怀悌《四书丛说》、汪绂《四书诠义》等,特别是胡炳文的《四书通》、《四书辨疑》和《大学指掌图》三部四书学论著,曾是明代胡广奉敕编撰《四书大全》的主要参考书^④。但是这些徽州人及其著作在《四书按稿》里几乎不曾见到。书中虽有几处引用了“新安陈氏”(疑是元代的陈栌定宇)(第79页、第111页、第184页)之说,但按照古人行文习惯上看,则江永在此处不应该称“新安”,而当称“我郡某公”或“同邑某”等。再者便是金正希(第133页、第150页),即徽州休宁人金声,为明末抗清义士,但书中既不隐讳其人,也不见有“吾乡某”之类的标识性言辞,有悖于学者行文常例。

2. 从语法辞气上以观其伪

本书的语言风格明显地存在着近代的新词新义,甚或带有口语成分。如《中庸》“问政”章之“‘仁者’节”云:“礼是天理之节文,有此天理便有此节文,这个礼难道不是天理所生成,与仁义同原,不假安排措置者乎?”《论语·学而》“有子”之“‘有子’节”云:“按此就现成说,好从心上来。不但无其事,而且无其心。满腔都是至和极顺的意思了。”《孟子·梁惠王》“见梁章”之“‘王

①《双池先生年谱》,第198页。

②江永:《近思录集注·序》,《四部备要》本。

③钱穆:《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》,商务印书馆,1997年,第341页。

④元代休宁人倪士毅师从陈栌、朱以礼,著有《四书辑释》一书。永乐年间,胡广修撰《四书大全》即以此为蓝本。《四库全书总目·四书大全》指出:明永乐间胡广等奉诏撰《四书大全》,阴据倪士毅旧本,潦草成书,又不善于删窃,庞杂割裂,痕迹显然。“其详其简,或多不如倪氏”。明程曦《新安学系录》著录自宋至明凡112位徽州理学家,皆有四书类著述。《皖人书录》收录徽州人的四书文册则更多。

亦’节”云：“按此总结上两节，前节为拦截语且含蓄，说此为实证语，在利害上分析出来，因此紧接仁义之效来说，故用前语倒转。”《孟子·告子》“‘生之’章”云：“按生之谓性，是他立论的本意，专以气言性，而不析到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处，故孟子以犬羊之性析之，便无可解。须知生之谓气，生之理谓性，朱子剖析最精，孟子固未暇与言也，又知觉属心，运动属身”。从“这个礼难道不是…”和“…的意思了”这样的语言，以及助词“的”和“了”的大量自觉地使用，可见《四书按稿》成书或在近代。诚然，明清时期的理学家的文章口语成分已经很多，但江永的著述严谨正规，绝无俗浅之语。他不仅在私塾馆中教育生徒，书写要字体宜正，恶俗陋体不可露于笔端，不作一字马虎，而且学术上重在实用的礼学、数学、声律之学，在语言运用的倾向上也是去俗就古，甚至有些深奥艰涩，如《近思录集注》就有些《史记》、韩、欧之风，不取义说。再将二书的文辞语气加以比较，可见《四书按稿》全系讲章套习，用语庞杂，且及近代口语，既不引宋以前旧训古注，也不涉训诂考据，与“缜密严栗，上溯古义”的江永文风迥然异趣。

3. 从著述态度上以察其伪

江永的有关四书学论著主要有《近思录集注》、《乡党图考》、《四书典林》和《四书古人典林》，其间都表现出朴学家审名实、重佐证、绝空谈的态度，对空泛的四书时文指责云：“迭相抄录，增损不一，事无提要，既不便学者观考，遍阅诸本，大都排纂无法，择言不精，往往拾瓦砾而遗金玉，事词蕃芜，不知芟薙。其有节目关要者，又或遭刊落也。古人在集注当考其事者，又未经纂录也。经传原文，臆为改窜，文不连属，妄为牵引，书无其语，漫尔标题，事在《四书》，犹烦赘述，此皆书体之病。”^①此言也可以说是对《四书按稿》的切中肯綮的批评。江氏曾言：“自讲章、时文之学盛，而注疏之学微，游谈无根，其弊也久。前明诸巨公于毛郑贾孔之言，盖有终身未一寓目者，观其著述与其时艺，即可窥其底里。是书引经稽典，必以注疏为主，后儒之说附之。注疏有未当，乃参考而明辨之，此穷经之方也。”^②由此可见江永精深于经学，论说有依据，著述有体例，与空谈尊朱子者异。

在细节问题上，此书还有许多错误。如《或问小注》是后人伪托朱子所作，“宋以来诸家书目皆不著录，诸儒传朱子之学者，亦无一人言及之。康熙壬午，始有陈彝则家刻本”^③，所以《四库全书》将其归于存目中。而《四书按稿》多次引用，则与主张“信而有征”的江永之学不相适合。又如该书常引《四书翼注》而不标注著者，不知是张甄陶的38卷本，还是郑献甫的12卷本。若是郑氏之书，则其伪迹更著，因为郑书在光绪己卯年才有黔南节署刊本。此外，在文字书

①《四书古人典林自序》，《四书古人典林》，安徽省图书馆藏本。

②《乡党图考例言》，《乡党图考》，清乾隆三十九年潜德堂刊本，上海图书馆藏。

③参见《四库全书总目》“经部四书类存目”之《或问小注》。

写方面也并不严谨,常出现衍脱倒缺及俗字现象,如“季”与“李”常混;《體注》中“體”字,有时写作“体”字(第139页、第209页、第223页),令人生疑;其他如该书第112页“此本王氏《困勉录》取之”中,“王”当作“陆”字;第154页“泔甘泉”当作“湛甘泉”;《说统》常颠倒为《统说》。诸多瑕疵,似与朴实严谨的学者精神有所违背。

三、对作伪动机的思考与推测

明清时期,因科举考试的需要,以四书五经为主要内容的时文册子大批涌现。“至明永乐中,《大全》出而捷径开,八比盛而俗学炽。科举之文,名为发挥经义,实则发挥注意,不问经义何如也”。^①胡广的《四书大全》、方苞的《钦定四书文》作为科举考试参考书地位的确立,使得士子不读经书原典,而求终南捷径,仅背诵各种四书类制义文集,弋取功名。乾隆帝云:“国家设制科取士,首重在四书文,盖以六经精微尽于四子书。”^②于是,儒生“以时文为重,时文以《四书》为重,遂有此类诸书,駢积割裂,以涂饰试官之耳目。斯亦经术之极弊,非惟程、朱编定《四书》之时不料其至此,即元延祐用‘四书义’、明洪武定‘三场法’,亦不料其至此者矣。”^③在名利的驱使下,制义副墨的收集、写作、出版也自然兴盛,名家的高头讲章、状元的精彩时文成为首选。尽管其中或有名篇佳作,但大多数还是村塾先生揣摩效颦的程式文。

《四书按稿》在明清众多的四书文中属于名不见经传者,为何署名江永?其中有何原因?通过上述的内容分析,我们认为此书托名江永,还是有理可循的。

徽州自朱熹以来,名儒辈出,明清时期中进士、得功名者不计其数,地域人文环境的令誉随着徽商的向外扩张,而声闻全国。江永为徽州著名塾师,一生从教60余年,曾受聘于翰林程恂以及儒商汪升、汪梧凤等世家大族,弟子众多,且多有成就,如戴震、金榜、程瑶田等皆一时俊杰,有“江门七子”之称。汪中曾记当时学术隆盛之事,云:歙县汪梧凤家聘请江永为师,又招好学之士来此切磋,日夜诵习,讲贯于不疏园中。久者十数年,近者七八年,业成而散去。江永歿后,朱筠来皖视学,尽取其书呈上朝廷,又使其配食朱子,于是天下之士彬然向于学^④。江永为徽州老儒,声名远播,盛名之下,附会之事自然亦多。江永曾注解《论语》中的《乡党》一篇,而成《乡党图考》,焦循称赞此书云:“婺源老儒,考核独及。著书饷世,人得摭拾。抑知江君,为学不厌。天文律吕,古今地邑。六书七音,罔不精洽。用之此书,众妙乃集。”^⑤老儒之书,精核独到,给科场士子

①参见《四库全书总目》“经部四书类二”下之案语。

②《清实录·高宗实录》四,中华书局,1985年,第12册,第16页。

③参见《四库全书总目》“经部四书类存目”之《四书人物考》语。

④汪中:《大清故贡生汪君墓志铭》,《新编汪中集》,广陵书社,2005年,第483页。

⑤焦循:《雕菰集》卷六《读书三十二赞》,《丛书集成初编》本。

带来诸多福音。钱大昕有记云：“[乾隆]丙午，江南乡试，以《乡党篇》命题，士子主先生说者皆得中式，由是海内益重其学。”^①江氏之书使他人得以中式，自己却以贡生终老于家。江藩称其“所著《乡党图考》、《四书典林》，帖括之士窃其唾余，取高第，掇巍科者数百人，而永以明经终老于家，岂传所谓‘志与天地拟者，其人不祥’欤”^②。言辞间颇有替古人鸣不平之气，但结果却是他人因“撝拾”江文，而得“取高第，掇巍科”的实惠。于是，江永的四书文如《四书典林》、《四书古人典林》“聊救制义家杜撰不根之弊，赵抚军序而刻之，几于家有其书矣”^③。此后模仿之作更是层出不穷，如福建黄云僊的《乡党考》、浙江金鐔的《乡党正义》、湖北胡薰的《乡党义考》、湖南魏晋的《乡党典义》、四川谭孝达的《乡党类纂》、安徽杜炳的《四书图考》等等，可见这位私塾老儒在四书文方面的影响。那么，作伪者选取江永作为《四书按稿》的作者，也有用意在其中。诚如江永所说：“科名之习，举世奔趋，利欲熏心，隐微深锢。鄙人拳拳礼乐，殚力儒先，亦自从吾所好。”^④至于坊间书贾，变换讲章面貌或改其姓名，则又事同幻化，百出不穷。综观《四书按稿》，其内容实不过陈因旧本，增损拼合，别标一书目、题一撰人而已，与江氏为人为学之风绝然不类。

江永屡称其文“体裁一新，力矫前弊，事之隐僻，未经搜罗者尚有之。若其著在简册，昭如日星者，固可一览瞭然，足资学者无穷之取材矣”。^⑤表明其书多是原本注疏，遍搜古义，渊奥博洽，纯正不蔓，深刻简要。惟其如此，连他自己也不看重的《四书典林》和《四书古人典林》，就是因为它们属于程式文的杂考类，而被《四库全书》和《清经解》弃而不载，那么托名江永的《四书按稿》则更在其外了。

《四书按稿》的作者和时间虽无定论，但其作者出于江浙皖地区，当不会有误。笔者曾就此问题，翻检和比勘了许多四书类古籍，发现《四书按稿》在著述形式上，与明末散文家张岱的《四书遇》很相似，疑是后人删减节录，再杂糅其他资料，挂名江永而成。如两书都以《大学》、《中庸》、《论语》、《孟子》为次序，不附四书原文，不分卷。每章都只取经文的前两字为名，如“康诰章”、“盘铭章”、“诚意章”、“治国章”等等。并且在用词和语气上也较为近似，如《四书遇·孟子》“山径章”云：“总见心学不可少有间断，孟子拔茅和孟母断机，是一般教法。”《四书按稿》“山径章”云：“张彦陵提醒高子处在‘介然为间’四字，总见心学不可少有间断意……按此不是专责高子茅塞，正要他有介然处蹊间。易塞亦易开，不用则塞戒之也。去塞之功何如只在静存动察？”如此

①钱大昕：《江先生传》。

②江藩：《国朝汉学师承记》之“江永”条，中华书局，1983年。

③《善餘堂文集·江先生七十寿序》。

④《双池先生年谱》，第199页。

⑤《四书古人典林自序》。

之类甚多。此外,如《四书遇·中庸》“无息章”云:“博厚六字是功,不可云同体,圣人与天地同体在至诚,不在博厚、高明、悠久。”《孟子·尽心上》“如此章”引张侗初之语云:“认得本心,一生更无馀事。”引张汝霖之语:“心体中打迭得干净,圣贤学问自一了百当。”在《四书按稿》中都有相近之语。而《四书按稿·大学》“修身章”云:“按首节不止之故,次节明身心之关,末节用正节言正心。不是将此心去正那心,但存得此心在这里。所谓忿惕恐惧等,自来不得。此谓二字,承上两节而不粘上两节。以次节尽不得修身之事故也。《存疑》:正心工夫,第一要紧在察字。察者,察其有所与否也。章句密察此心之存否,即是此意。按心该动静,而此处单就动边说,故正工夫重在动察而暗含静存意。”这与《四书遇》的相应部分的解说内容和文字语气都较为相近,其间似有前后杂糅与改编之嫌。但《四书按稿》从未提及张岱或《四书遇》,这也许是作伪者常有的心态和常用的技法。

关于《四书遇》的思想与文风,张岱的同乡、今人马一浮先生曾评之曰:“明人说经,大似禅家说公案,张宗子亦同此血脉。卷中时有隽语,虽未必得旨,亦自可喜;胜于碎义逃难,味同嚼蜡者远矣。”^①众所周知,清代的考据学家攻击明代学人解说经义似禅家公案;理学家则抨击考据学者的考证是碎义逃难,无关性命大旨。而江永与张岱正是这两种人的典型代表。就是说,《四书按稿》若为江氏所为,无论在学术思想还是为文风格上,都是不合情理的。又据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年出版《四书遇》一书的整理者朱宏达介绍:1934年,浙江省图书馆购得《四书遇》抄稿本。原书曾藏于常熟周氏鹤峰草堂,首页有“虞山周左季鹤峰草堂藏书印”记,长方白文,中有“周大辅”白文方记,和“曾经鹤峰草堂周氏所得”朱文方记。周大辅,字左季,江苏常熟人,民国初年杭州著名藏书大家,积书万卷,时称左公。此人尤喜藏传抄稿本和抄录稀见善本,甚至还有为清代所忌讳的许多禁书。巧合的是,《四书按稿》中有名为“佐案”的按语多条(第109页、第156页、第157页),但不知姓氏,从按语的体例和内容来看,当是“姓某名佐”的某个人。但鉴于周氏所藏《四书遇》与《四书按稿》的相似性,笔者虽然不能判定《四书按稿》即为周左季所纂,但结合文体、避讳等事体,可以推测《四书按稿》是节录或掇拾《四书遇》之类的前说杂糅而成,是清末民初与周左季同时之人所编纂的一部四书讲读文稿。至于张岱、江永等人的四书学思想及其特点,已另行撰文加以考证。限于篇幅,此处稍做提示。

江永是康乾时期转移学术风气的关键人物,在清代思想文化史上具有重要地位,对于他的著述真伪的考辨,不仅影响到人物思想面貌的定位,也会牵涉到时代思想文化研究的诸多方面,后人不得不慎重对待。

作者工作单位: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心

^①《四书遇题记》,收入朱宏达点校《四书遇》,浙江古籍出版社,1985年。